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97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三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國際軍閥及研究系列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三辑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昆明

责任编辑：李惠铨
封面设计：鞠洪深

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

第三辑

西南军阀史研究会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375 字数：330,000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00

统一书号：11116·116 定价：2.55元

目 录

- 关于军阀史的研究.....来新夏(1)
- 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谢本书(18)
- 国民革命军与西南军阀.....张克谟(32)
- 略论西南各省“自治”潮流和“废督裁兵”的呼声.....郭剑林(48)
- “滇桂战争”散论.....莫杰(68)
- 旧桂系对广东的扩张及其失败述论.....黄宗炎(81)
- 旧桂系时期的民族资本与商品市场.....侯雅云(97)
- 新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的农业经济.....李柄东(106)
- 新桂系李宗仁在玉林发家浅论.....罗重实(120)
- 广州张黄事变.....彭梅娇(137)
-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 孙中山对旧桂系的认识和斗争.....夏琢琼(152)
- 龙济光在粤军阀统治述略.....倪俊明(168)
- 湘鄂战争及其影响.....唐苏妍(186)
- 一九三〇年军阀何键两次失守长沙述评
-李柄圭 张经国 魏汝珍(205)
- 湖南军阀形成时期的特点.....成晓军(222)
- 从四川盐务稽核所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宋良曦(235)

四川军阀与鸦片·····	匡珊吉 羊淑蓉(250)
刘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宋琦(263)
从刘文彩家族的暴发看四川军阀的 封建性和掠夺性·····	曹德明(275)
评唐继尧督黔·····	冯祖贻(287)
试论云南护国起义·····	顾大全(302)
军阀王家烈的垮台·····	陈集忍 乔云生(318)
试论黔系军阀的依附性和掠夺性·····	刘毅翔(326)
兴义系军阀与贵州五四运动·····	熊宗仁(339)
为军事扩张服务的贵州财政 ——一九一二至一九三五年贵州财政史之一页·····	吴敦俊(354)
论“二·六”政变·····	荆德新(372)
唐继尧前半生的功过问题 ——兼论滇系军阀形成的时限·····	高光汉(389)
论“靖国战争”·····	孙代兴(406)
附录：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 收到论文、资料目录·····	(423)

关于军阀史的研究

来新夏

这次应邀来滇参加西南军阀史讨论会，一方面为有机会向更多同志学习而感到快慰；另一方面又很惭愧，因为我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接触北洋军阀史，但除了在当时写过一本小书《北洋军阀史略》外，这三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无甚增进。今天，大会主持人要我作一个发言，我只能把我们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与天津地区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向到会同志们汇报，以听取教益。

天津研究北洋军阀史主要是三个点：南开大学历史系有六个人，半数人已到会（即郭剑林、焦静宜和我）。我们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天津社科院有一部分同志，杨思慎、孙宝铭同志这次也到会，家里还有几位同志。另外就是天津历史博物馆，拥有一批北洋时期的资料，其中黎元洪的材料比较多，有几位同志在研究与整理。这三个点，我本职在南开；又是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的兼职研究人员；历史博物馆的同志除有过去的学生外其他同志也比较熟，因此我妄自尊大地结合天津的情况，就军阀史的研究问题谈四点看法。

第一点，谈谈研究军阀史的意义。

军阀是历史上的一个客观实体，所谓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都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的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它是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而近代军阀、特别是民国以来的

军阀，其地位更为重要。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可一世，在播弄着历史，但又终于先后被无情的历史所嘲弄、所唾弃。这样一种风云变幻的历史现象，其间有无数可供后人来论定分析的问题。如果对此置而不问，那就看不到历史长河中滔滔洪波的漩涡，也难洞察其泛滥横流的病源所在。研究历史，重要问题在于用。研究军阀史也在于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病源。如果有人认为军阀史只是历史的反面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历史上的正与反辩证发展的统一体将失去其一面，知其一面而不知其另一面，那将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严重缺陷。这些基本道理本来是容易讲清的，也是容易了解的。但在过去的某些年代里，军阀史的研究受到漠视，有些同志视之为“禁区”而不插手；有些同志甚至提出质疑，认为研究军阀史是舍正途而不游，是一种走偏锋的猎奇，是抢冷门。致使这方面的研究处于蠕动和爬行，学术研究成果不显著，形成一种“旧著难找，新著很少”的局面。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有关的公私档册等资料开始整理印行。学术组织的建立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促使研究成果日趋繁盛，即以发表的论文专著及资料来说，粗略的估计一下，当比前三十年的总和要多出几倍。港台学者也有部分人从事这方面项目的研究，写出一些著作。海外学者也有一些人注意及此。这是军阀史研究领域的新局面。大家都感到欣慰与鼓舞，但这不等于说一无阻力了。听说还有人开展军阀史研究持保留态度，认为历史领域中可研究的方面很广，何必一定要为军阀去树碑立传呢？我们认为：如果让从事军阀史研究的同志讲讲军阀史的意义和重要性，阐述一下该不该研究的道理，那是可以做到言而有据，毫不费难的。但我以为最重要的问题不在讲某些道理，而在于要有实际行动，要拿出真正的成果来做有力的回答。这才是对开展军阀史研究的一种真正的推动力。因此，我想讲点实际问题，讲讲军阀史研究的课题问题。

第二点，谈谈军阀史研究中的课题问题。在近代军阀史的研究中，无论是对早期的湘淮军阀，还是后来的北洋、西南等军阀都有过一些专门性的论述。但是这些论文专著，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还都远远不能适应当前这一学术领域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加深、订正和补定的工作。从发展学术研究的规律看，凡要发展本学科首要的工作在于选定课题。有了课题，研究工作才有着手处。军阀史的研究课题应该如何考虑呢？我认为，根据当前状况应从三方面来考虑。

（一）理论性的探讨：过去的军阀史研究属于搞清事实、评价人物、概括综述者居多，理论方面的探讨就比较少。其实，在近代军阀史中有不少涉及到理论问题的内容，如对军阀性质特点，即其概念定义的探讨，就是一个需加解决的问题。这里必须申明一点，即搞清这个问题和编写某本书必须先搞清概念才能写是两回事，一定要分开。书尽管写，并不是要先把所有基本概念都搞清才动笔，那是因噎废食。但是作为整个领域的研究而言，这个问题又是必须搞清楚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其他问题的研究就多少受些牵涉。比如我们研究某个军阀人物，结果人家从理论根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用“地方实力派”等等概念来代替，那就会使研究工作走弯路。去年十月间，民国史编纂工作十年的小型纪念讨论会上，涉及到这个问题，李新同志提了两条，一个是私兵，一个是地盘。有些不同的意见。前天，李新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又加了一条武治。由两条改为三条，是不是就可按此办理，我看还不急于定论。这个问题已是几十年来军阀史研究中的老问题了。早在民国初，梁启超作为参加过军阀政治活动的局内人，在分析军阀产生的原因与特点时就曾谈到过；以后无论在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都有人谈过，甚至连蒋介石本人还对军阀一词下过定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也给予了一定的注意，如港台、美日就曾有人谈到两种政治结构结合

的问题，即一个是官方政治机构，一个是地方绅权的政治机构。这或就是陈志让教授所谓的“军绅政权”吧！这已不只是一两个人的看法，有好几篇文章都论到这一点。总之，军阀的定义目前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说，这个问题只是探讨的开始，而不是下结论统一概念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要单纯地从军事角度去看，而应考虑到政治性的含义。私兵、地盘、武治等等条件多是从军事着眼。其实，武治也是政治，这是军阀政治中的一种统治形式；军阀混战也是军阀政治矛盾的最高爆发点。武治并不能把所有的军阀都概括进去，军阀也有文治，至少有文治成分。有不少军阀标榜文治，就如云南的唐继尧就有文治，他办了个东陆大学（云南大学的前身），办教育、提倡文化。军阀不都是用刺刀来统治的。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那就是军阀政治的理论基础问题。军而成阀，总是成串成团，单独存在不能称阀。它上有源、下有根，上上下下自成系统。系统内下级要服从上级、效忠上级。这种从上到下究竟渗透着什么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共同理论基础。我看是不是可以说，这是一种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封建伦常关系为纽带的统治，形成一种层叠性的宝塔式统治。长幼尊卑、上下隶属关系十分严格，自成系统。如果没有系统是不能称为阀的。过去梁启超在分析军阀产生问题也谈到过一种想法，他谈了向心力和离心力的问题，他认为辛亥以后原来对清王室的忠君观念瓦解了，而国家观念和革命大义又未能取而代之。因此国家失去了向心力，分离主义随之而起。这种分析也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了。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可把前人的研究和港台以及国外学者的研究综合考察，根据史实分析，提出一些见解。我们在研究北洋军阀史中也考虑过北洋军阀的形成问题，它是不是袁世凯的个人问题，它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我们认为它是历史进程中内因外因关系结合发展的一种结果。它的形成既有外在的条件，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依据。从当

时的情况看，北洋军阀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清朝晚期已从它历次“内忧外患”中充分证明旧军的腐败不堪。因此在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就出现了“一时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以改革旧军制的潮流。这种改革要求是符合清朝统治者需要的，因为每个统治者都需要有一种保护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能否维持统治是统治阶级生死存亡的利益所在，所以不仅同意章奏，而且立即见之行动。从整个社会经济来看，由于外国的侵入，我国的社会经济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了。自然经济有所触动，但封建势力仍然严重存在，只是在封建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也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内容，特别是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在物质上为新军的建立准备了装备基础。由于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人民生活中也有了异动，农村由于破产而产生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内地交通线改变，有十来万依靠这条运输线为生的人成为流民群。湘军兵源有不少来自流民群。北洋建军之初也是如此，北洋常备军第一镇就是由王士珍、王英楷等带着一百万大洋到河北省正定、大名、广平、赵州去招募六千人。这些人中后来有一些就上升为大大小小的军阀了。在思想意识上虽然存在着封建意识，但已不是过去“华夷之辨”的封建意识，而是“中体西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识形态了。袁世凯建军时的练兵方针就包含这两方面。他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就是要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固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精通军事技能。他认为“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这就是一种“中体西用”的形式。所以北洋军产生的条件，无论从当时清朝统治者的需要，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都已具备了新的军阀势力出现的条件。就在这个时候，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有所改变。由瓜分中国变为物色代理人的政策。这个外因通过上述的内因，就给北洋军阀势力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袁世凯的个人作用。

我们认为袁世凯为北洋军阀的兴起作了三件大事：一是组织人力，准备了北洋军的干部；二是制定了章则，包括建军思想、军队正规化的标准、行军作战的规章等；三是抓住了战机，一种势力在发展过程中要是不能洞察战机就不易成功。至于北洋军阀集团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如何评定？我们认为：北洋军阀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支柱，是辛亥革命时转移政权举足轻重的力量，是掌握民国十六年中央政权的统治者，是中华民国对外关系的代表人，是制造灾难、祸国殃民的罪魁，是一个从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是平衡以后的不平衡而为再一次平衡的前奏。它的历史作用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对旧军制的一次重大改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指出过，对历史的评价看它是否比前人增加了新东西，而北洋新军无论从建军思想、军械训练、战略战术各方面都不同于旧军，这是应给以一定历史地位的。它的另一个作用是十六年的纷争战乱做了一个历史上很好的反面教员。它的混战纷争现实唤醒了人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既是最黑暗而反动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反抗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酝酿与建立都在这一时期。就是孙中山也被北洋军阀统治现实所觉醒，认清了民初以来军阀、官僚、政客三位一体的统治，而向新三民主义转变；北洋军阀还有一点反面作用是为新军阀提供了干部。桂系、晋系、国民军系等等都是从北洋军阀系统与其他地方军阀系统中演变而来的，就是说旧军阀为新军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北洋军阀间的纷争火并结果，逐渐经过大吃小而最后为新军阀的再次统一扫除阻力提供了条件。

在军阀史研究中还有一个阶级基础的问题值得探讨。关于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大地主大买办。大地主问题事实具在，它也代表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称之为买办是指它代表了帝国主义利益。这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划定阶级地位主要是以经济为标准，我们只能说北洋军阀是帝国主义在华的

政治买办，而不能说它建基于买办阶级之上。另一种说法是地主资产阶级，说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要注意时间和阶段的问题。北洋军阀之含有资产阶级性质并非开始即有，而是发生在后期，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开始的，所以二者不能并列，而且连年混战对资产阶级利益是有所伤害，有所触动的。资产阶级不喜欢混战。商品被扣、到处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都不是资产阶级所欢迎的。我们没有采用二者并列的说法，而是认为北洋军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它的某些部分在一定时期进入了资产阶级行列而具备了资产阶级特色，大致时间在1914——1925年之间。在这个期间，据天津的调查资料，天津新建工厂26家，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十一家，占26家的42.3%。这十一家工厂的资本总额共有1572万元，占26家总资本额2926万元的53.7%。这就使某些北洋军阀带上了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是不要搞简单公式而要具体研究分析，因此我们在《北洋军阀史稿》一书中就说“北洋军阀是以地主阶级为它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在一定时期带有资产阶级性质”。正因为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北洋军阀的封建性意识比较严重。它开始以封建伦理观念作为建军思想，要求忠君爱国，进而要求忠于北洋团体，再进而要求忠于袁官保。它还接受了传统的中国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所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无论哪一派、哪一个人实际上割据混战，但总以统一为幌子。掌握雄厚实力时，就进行“武力统一”；如果羽毛未丰，力量尚弱时，就宣传“和平统一”。总之，虽在行割据之实，但无不唱统一调子。这一情况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有关。可是，由于它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性质，故它跟中国历史上的军阀，甚至跟湘淮军阀相比又有了某些特性，主要表现在北洋军阀主持政局时，它经常运用一些被扭曲了的西方资产阶级制度，这就是为什么封建军阀当政时还

要动用政党、议会、选举等等所谓“民主制度”的原因之一。

(二) 史的研究：军阀史事在我国有故老相传、口书笔录的情况。年岁大的同志对军阀混战的灾祸、军阀人物的遗闻琐事多有耳闻目睹，并不生疏。问题在于这些史实的准确程度、完备程度、可靠程度怎样。我们研究史事的基点是：一是深入探讨，二是填补空白。有些问题似乎人们已很熟悉，但不一定完整而需进一步探讨。如大家比较熟悉，且又作过一些研究的联省自治问题，过去的评论有点简单化，前不久邹小孟同志写的一篇《联省自治浅析》曾着重分析了联省自治思潮与联省自治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我们组的郭剑林同志这次带到大会的论文《论联省自治的潮流》，对联省自治作了评论，认为其中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又如“张勋复辟”，大家都很熟悉，一般认为这是有封建顽固思想的张勋乘黎段交江的府院之争而制造的一出丑剧，过去这方面文章寥寥无几。但如从它所继承的思想资料、适应的社会思潮、各种社会势力的纠合，帝国主义的播弄等方面看都还有研究余地。我们组的焦静宜同志就选择了这一余地写了一篇《论张勋复辟》，也带到会上来求教。又如两次直奉战争，为什么直系先胜后败？按理说，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胜奉系后，掌握了全国政权，居于优势地位，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反而败于奉系呢？过去有许多分析与解释，如说吴佩孚的反动真面目暴露，失去了人们原有的盲目“信仰”；曹锟贿选闹得直系声名狼藉；连年内战，民不堪命；直系内部兵骄将悍，分赃不均；而最为人所乐道的是冯玉祥反戈一击的“北京兵变”，决定了直系的溃不成军。这些都是理由，但总感到还需要找一找其他更具体的原因。我的研究生娄向喆选了一个《直系军阀的财政危机》的课题，搜集了大量资料，研究结果得出了直系在二次战争中已处于“外债无源、内债难举”的财政崩溃状态。这就引起我们回想到辛亥以后张謇以财政卡孙中山，迫使让位的史事，感到

这种财政危机应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在北洋军阀的研究中，政治军事方面较多，而经济方面就较少。天津社科院的郝庆元同志近几年来着重在研究北洋的经济问题、研究经济机构、经济人物，如周学熙这个人物就很有研究余地。他已搜集和整理了一些资料，写了文章，也准备写专著。我们南大经济所有几位同志研究开滦、启新、华新等企业，搞了不少资料，也有论著。经济方面的研究看来余地很大。至于文化方面更需要填补。

在史事研究上还有些值得考虑的课题，如北洋军阀各派系的特点、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的异同，为什么西南偏处一隅，而历次反北洋斗争都插手了；为什么北洋掌握全国政权却较早地覆灭，而西南一直岿然不动，直到解放，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抚慰一下。又如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我看这方面大有余地。不能简单地搞各有归属，如直系与英美、皖奉与日本；而要探讨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些说法是推理出来的，缺乏确实的史料依据；有些材料是从政论性文章中转引，而非原始来源；有些找到买卖军火的事实就断定为彼此勾结，证据似嫌薄弱，因为有可能是军火商做买卖，勾结要看是否是以出卖主权来换取；有些材料形式上是原始，但内容并不可靠，我们曾从二史馆找到过一张反吴佩孚的传单，说吴卖给英美几条铁路主权得到四亿美元，署名有八团体，但我们找不到吴佩孚出卖了哪几条铁路的旁证材料。这是急需填补空白的课题。

人物研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有难度，有两种障碍，一是人们对一些有名的军阀人物有传统看法，如对吴佩孚与段祺瑞看法就不同，吴佩孚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好点；另一点是有些人人物有传奇色彩，如对张作霖的红鬃子出身，枪法如何神奇，如何对付日本人等等。这些都需有大量确切资料去认真评述。近年来这方面研究颇有进展，东北在开展对张作霖的研究，常城同志写

了本《张作霖》，其他同志有论文，有译著。辽宁档案馆还专题整理了张作霖的重要电稿，已有油印本。西南地区对唐继尧、陆荣廷的研究也有成果。在北洋史方面，比较多地集中到吴佩孚。这个人物已引起北洋史研究者的兴趣。台湾出了一本《吴佩孚传》，在史料运用和人物论定方面都有可商榷之处，有重新研究的余地。我们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对组内学术见解分歧认为应象蔡元培那样兼收并蓄，让诸说并存，相互讨论。我们有位同志对吴评价很高，我不太同意，就各讲各的。我比较保守，认为吴佩孚是以一个爱国军人面貌崛起，利用皖系的失人心，他以两种手段夺取两个人心，一个是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来赢得人民渴望和平之心；另一个是反对皖系的媚日卖国来赢得人民爱国救亡之心。得人心者昌，吴佩孚利用它骗取了人心，使许多人在一定时期寄希望于吴佩孚。吴佩孚在此基础上，又自我标榜。这种标榜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他一方面以儒将自命，崇尚关岳，“维护”华夏尊严，以适合封建主义守旧口味；另一方面聘请洋顾问，改革军事操练，以适合资产阶级维新要求。中体西用，二者结合，自我塑造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基本形象。在此情况下，他又高唱救国爱民、劳工神圣，以允许共产党人的活动等等伪装来提高威信，同时也争取到英美帝国主义鼓吹他的长处与才干，造成非吴不能救中国的“感觉”。这些都是吴佩孚为夺取更大权力所使用的权术。吴佩孚的真正意图和思想要求并非如此。他只是由于处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形势下不得不如此做作一番。我们不能象有人说吴佩孚是五四运动的助动力，相反地，五四运动对吴多少产生了点推动力。吴佩孚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军阀，他为适应基础的需要接受点新事物，采取某些装点自己的作法而已，不能估计过高。一旦气候变化就面目全非了：“二七”屠杀工人，为曹锟贿选尽力，与奉张结成反赤联盟，对抗北伐等等，尤其是1921年发表的

《循分新书》更露骨地主张：“遵循孔教以达圣人境界，共和显示了社会道德的衰微，而振起废唯一之道是复兴儒家文化。”这足以说明他的思想主流和行为目的。

在理论探讨和史实研究的基础上写一部专著，看来应提到军阀史研究日程上来了。这一当务之急被西南军阀史研究会抓住了，如果说前一阶段，我们三人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稿》的话，那比之于《西南军阀史》的气魄、规划，真是自愧弗如了。我看了《西南军阀史》的提纲，这种备配集结人力的作法和真诚团结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

（三）动态的综述分析：这是一个重要而被忽视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偏见，写一本书或一篇论文会受到社会的重视，如果只写一个动态综述就认为只是把资料综合一起，作用不大。我看这是不明内情的偏见。我认为动态综述与分析应放在科研课题的高度来对待。动态综述与分析应是社科情报的重要内容。我国社科情报比较迟缓，在当前知识爆炸年代是不适应的。一个人要把本领域的文献看完或绝大部分看完，是有困难的，因此就需要有一些搞动态情报的服务性工作。我们由于不注意动态分析，许多课题往往落在后面，甚至重复劳动。台湾学者近几年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如张玉法编了一部《中国现代史论集》丛书，这部书有十辑，收集了评介论文和专著的主要论文，其中第四、第五两集是1912年到1928年，即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虽是编动态资料，但也有观点，他的第四集包括1912年至1916年的袁世凯时期，标题是《民初政局》，以表示不承认袁世凯是军阀，其中包括政党政治、二次革命、洪宪帝制等专题；第五集包括1916年至1928年，标为《军阀政治》，其中包括一般解释、历史叙述、军阀政治、军事派系、联省自治五部分，其选文二十二篇。这些文章使我们了解到过去一些了解不够的东西。当然，他所收集的也不完全。我们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据粗略了解，1980年